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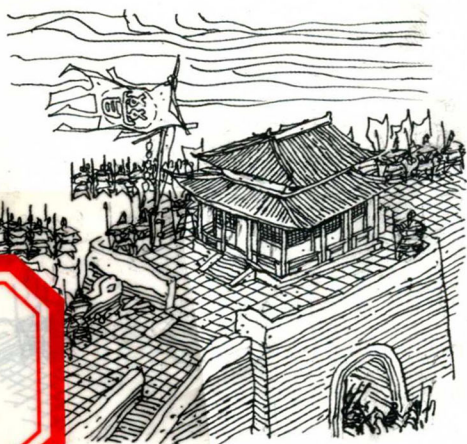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十七辑)

总主编 / 李玉明

春秋新田晋都漫话

谢老亭
／著

本书经过作者多年从事侯马晋国遗址的发掘工作，对“新田”的历史与现状作了一番诠释，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值得我们去研究探索。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冬梅

张 熔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董高怀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17辑)

春秋新田晋都漫话

谢尧亭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25 字数:300千字

2005年12月第1版 2005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900362-73-8

G·34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李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一、从迁都新田说起	(3)
二、新田的地理举要	(6)
三、由上马墓地说礼制	(8)
四、新田考古与文化保护	(14)
五、新田都城三级说	(17)
六、由曲沃谈到新田的宗庙和社稷	(20)
七、新田手工业随想	(28)
八、新田墓地启示录	(37)
九、新田晋国文化的归宿	(38)

引 子

随手一翻，
翻动的是历史文化积淀的神韵。
今天的人，
你也必将成为历史的一员。

我们
秉承祖先的血脉，
只是传送链上的一个扣环，
也许太渺小，
也许太匆匆，
如迅忽的流星，
不待划破长空，
已然无迹无声。

从时空观人，

从人观时空，
历史
不过是我们祖先的
前日彩霞
昨日红花。
片片皆有来自，

朵朵都是精华。

精灵如人，

你是天地之间

万物之中

最有思想和意识的群体。

珍爱生命

珍爱历史，

就是珍爱我们自身的血脉和灵魂。

前有古人，

后有来者，

过去、现在、未来，

条条块块

都是

关乎我关乎你关乎他的

事、物、情、境……

何不惜昨日红花前日彩霞，

何不惜今日良辰美景

好时空。

随手一翻，

太沉重，

往古

长长的画卷，

祖先，

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浹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也。……夏四月丁丑，晋迁于新田。”于是在公元前585年晋景公将晋国的国都——也可以说是首都——迁到了这里。在春秋战国时代很多城都可以称都，但并不是都能称国都。在迁都到新田以前晋国的国都就叫“绛”，也就是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曾居住过的都城，目前还没有找到这处都城的所在，但却找到了由它所迁来的新田。在迁都新田之前，新田邑或城就已存在，而且应有一定的规模，这些都是国君选择迁都的重要原因，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在侯马市西南部上马村东的上马墓地就发现很多迁都以前新田时期的墓葬，也发现有这个时期的遗址。

当时晋国将都城迁到新田当然是一个不小的举动。古代国都频繁迁移，不外乎政治上、军事上或者经济上的几方面的原因。政治需要主要是旧都的遗臣故老、武功贵族多年培植自己的私家势力或互相之间盘根错节，钩心斗角，使国君产生了一种危机感，有必要迁离故地另栖新都。军事上主要考虑安全因素和攻守需要，攻者与守者择都的标准肯定是大不相同的，比如秦国为了向东方扩张，其国都曾自西向东多次迁徙，守者受到攻者的军事威胁，选择国都要到进可攻退可守的区域上最适宜的地方。经济上主要考虑的是土地的开发、利用和自然资源的攫取远近等等，因此没有无故的迁都，但迁都的原因也可能各不尽同。像晋国将都城迁到新田的主要原因是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因为故绛都赵氏家族的势力随着斗转星移而与日俱增，一些旧族之间的积怨也越来越深，有些事情已经不是国君所能左右的了，

军事上的原因主要是考虑新田地理位置优越,有山河屏障和交通便利,而不像郇瑕之地(今临猗县一带)那样近秦,易受攻击而无屏障可守,当然也考虑到了经济上土田开发的利弊,因此晋景公欲择新都以居。

新田这个地名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字面意义是指新开垦的土地,《诗经》上有“新田”一词,《诗经·小雅·采芣》“于彼新田”,《毛传》释“一岁曰菑田,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也有说三岁为新田的,其义或古雅合宜。晋景公是在位十五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585年将国都迁到新田的,这在《左传》上有明确的记载,实际上都城的营建是此前的几年时间,是比较合乎情理的。晋景公是晋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的国君,在他当国君时还发生过族灭赵氏的事情,史称“下宫之役”,也就是后来演义流传甚广的“赵氏孤儿”的故事。晋景公迁都之前的国都名“绛”,将国都迁到新田之后还叫“绛”,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绛”是晋国都城的一个专用词,像楚国国都的专用词“郢”一样,类似后世的“京”。但为了区别所迁,就别以“故”与“新”,由此“新田”也就称为“新绛”了。值得注意的是“新绛”一称今天还在沿用,不同在于当时的“新绛”指今天的侯马市,而今天这个称谓不在侯马市而是指新绛县,原因是当时晋国都城的范围与今天的侯马市并不等同,实际上今曲沃县的一部分和新绛县的大部分都在都城的范围内,像今日在新绛县东南发现的晋国祭祀遗址和墓地等等明明白白是晋都的遗存,因此新绛一称历经历史地名的迁来改去而不变其真,可见文化传统的生命力之强盛,新绛县城在唐代曾是威名远播的“绛州”府衙

所在地,影响是非常大的,今天的新绛县名是民国元年设称的,有时候历史文化的穿透力和辐射强度超乎我们常人的想象。由此我曾联想“故绛”是否与今日的“绛县”有关,或者说“故绛”就在今绛县一带或其附近,因为在绛县有很多关于故绛时期的传说和古地名,甚至晋献公、晋文公、晋灵公、大夫狐偃的墓葬都有传说在这里的确指,而在这里考古工作却做得极少,据《续修曲沃县志》记载“时晋都古绛,踞绛汾之源”,正是在今天的绛县与曲沃、翼城交界一带。

二、新田的地理举要

既迁“新绛”,在地理上肯定有一定的优越,首先是有“汾、浍”两条河流的交通便利,当然,今天 we 看到的汾河实在有些可怜,而浍河则纯粹变成了污水沟,这与古代是大相径庭的,这可能也是古人所始料未及的,稍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应该知道,在山西万荣县西部的黄河岸畔有一座著名的后土祠,当年汉武帝为祭祀后土而南渡汾河,在河中赋咏了那首著名的《秋风辞》,辞是这样写的:“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燕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西汉武帝时期汾河还可以行驶“楼船”,其水之大可以想见。见于晋国史记载的如著名的“泛舟之役”(公元前647年),这件事发生在晋惠公(即晋文公重耳的弟弟夷吾)的时候,

那时的国都还在“故绛”，当时晋国发生饥荒，秦国救晋的船队“自雍及绛”绵延不断，雍是秦国的首都，在今天陕西省的凤翔县一带，运粮船从渭河顺流而下渡黄河逆汾河而上，船队相继，水道自然要便捷很多，可见当时浍水也不是一条小河，在汉代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曾提及浍水，说“水出霍山西南入汾”，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晋出公五年，浍绝于梁”，北魏酈道元《水经注》中也录有“浍水”条，可见这并不是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河，古代更不是一条如今的排污沟，这倒真应了迁都时韩厥（献子）所言“汾、浍以流其恶”的说法，难道当时也将污水秽物有意排入汾浍而汇入黄河大海以至于今？听来似乎有些玄机，但所言“以流其恶”与今日之“以流其污”同音而异实，倒是饶有兴味！

侯马地区的山川地形在军事布防上自有它的优越，东南有“绛山”（又名紫金山），西南有峨嵋岭，山岭之间孔道狭窄，即是隘口，今有隘口村于此，有关名铁岭关（或说铁刹关），历代这里都是一条交通的咽喉要道，在《读史方輿纪要》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朱温争河中，先取晋绛，克用遂不能与抗。”绛山、峨嵋岭、浍河处其南，汾河绕其西北，形成天然屏障，远有吕梁、中条、太行、太岳诸山环护，诚如春秋时宰孔所云：“景霍以为城，汾河涑浍以为渊。而子犯所谓表里河山者也。”也正如被周景王斥骂为“数典忘祖”的晋国大夫籍谈所言“晋居深山之中”，新绛国都之东，没有近距离的天然屏障，相对而言，略显薄弱，因此为加强东面的防御和安全，在东部营建了几座小城，分别是马庄、呈王和北坞等等，其具体的功能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但作为一道防线是

不可置疑的。不过到目前为止,在侯马晋都遗址还没有发现郭城的线索,有人说晋国当时国力强盛,又有山川之固守,似乎不需要郭城,推断新绛没有郭城,我认为郭城还应该是有的,只是目前还没有发现而已,因为我们没有主动去调查勘探,工作还没有做好。至于郭城的范围日本有一个学者叫江村治树,他在宫城东划了一个方框,将宗庙纳入其中,不过仅仅限于推测而已。我想今日的宋郭村、郭村、郭村堡、北郭马、南郭马这些村落名称或者与古代城郭有关,像今天侯马的台神、平望、程王、鹿祁、观庄及贺村等等都是古代地名,其来历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如果这些带郭字的村名与当时的城郭有关,我们就大致可以框定一个范围,分别将南、东、北三面范围划定。像目前在侯马发现的没有郭城的晋国都城在中国古代特别是东周时期还确实是十分罕见的。

三、由上马墓地说礼制

晋国迁都新田之后我们将它称为新绛时期,而将它之前称为新田时期(仅限于侯马晋都一带),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概念,新田与新绛时期是早晚不同的两个阶段,不可混为一谈。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像上马墓地的大部分墓葬都是新田时期的,而只有一少部分是新绛时期的,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迁都前后文化的发展变化,应该说分别新田与新绛是有很重要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

新田时期涉及到晋国的故绛时期甚至更早的翼都时期。晋都新绛时期共有十三代国君,经历了209年,后被韩、赵、魏三家所瓜分。这209年是晋国盛极而衰、由强变弱、由君权走向卿权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思潮(或思想)风云激荡、诸子百家竞风流的时期,崇尚思想自由,百家争鸣之风与战国的政治形势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其实历史上这样的时期有很多相似之处,如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民国时期等等,文艺可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突破陈规陋矩的束缚而喷发出生命的激情与光华!而非盛世的矫柔与粉饰,否则何来千岩竞秀,百舸争流也!

在新绛的十三位晋公中晋景公和晋悼公是最有作为的两位,后者更是晋国历史上继晋文公之后的一位杰出君主,他整顿吏制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革故命新:“(公元前573年)二月乙酉朔,晋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责,逮鰥寡,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时。使魏相、士鲂、魏颉、赵武为卿。……”晋悼公执政十五年,采取战争和外交手段围宋伐郑以疲楚,任用魏绛“八年之中,九和诸侯”,晋国霸业中兴,出现了所谓的“悼公复霸”局面。

新田时期究竟有多长,从晋国初封统领今侯马地境时就应该新田时期的开始,下限则定为晋景公迁都到新田时为止。在侯马境内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发现也不少,在上马、单家营、东高、下平望和乔村都发现有西周时期的遗存,但研究的还很不好,实际上在晋都迁此之前,新田的人群即有土著与周人,还杂有部分戎狄居民,这从上马基地的墓葬

中可以清晰的看到一些文化因素上的不同。譬如说上马墓地发掘的 1370 余座墓葬中墓主的头向即有向北和向东两大类的不同,向南向西方向的则较少,通过分析我初步认为头向北的墓主应是周人,而头向东的则为土著居民,明显的一个例证是所有的贵族铜礼器墓葬墓主头向均是向北,而没有一例向东者,而这些贵族显然是分封到晋地的周人,从头向可以看出,周人和土著人是分区域埋葬的,两个大的人群同处一墓地并在一墓地有明显的区划,这说明当时的墓地是统一规划的,这就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所说的“邦墓”墓地,聚族而葬,有专人负责管理,不同的家族埋葬于不同的区域,同一家族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排列墓位,上马墓地晋国迁都新田以前的墓葬可能是新田时期新田邑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聚葬于一个墓地的显例。上马墓地的陶鬲也可以分为周文化、土著和混合型三类,这也反映了人群构成上的不同。从埋葬的墓葬数量可以看出墓地自西周中晚期始启用到晋迁新田后逐渐衰落,到春秋晚期战国初年墓地即被废弃不用。上马墓地是国家文物局拨专项经费主动发掘的一处墓地,当年根据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指示要“一个不漏地发掘”的原则,应该说这个墓地的工作做的是比较细致和彻底的,它是研究周代历史必须要使用的重要资料,因此上马墓地在东周时期中国考古学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上马墓地》发掘报告已于 1994 年结集出版,但对上马墓地的研究可以说才开了个头,正如报告的序言所指出的那样这处墓地当年在发掘的时候唯一的缺憾是没有能大面积有计划地整体揭露,而是

通过钻探的方式获取信息资料,然后发掘,我们知道钻探仅是通过分析土样而提供线索,并不能将所有的墓葬分布信息都采集完整,如果在钻探资料的基础上采取全面揭露的方式发掘就更科学了,也不会给后人和研究者留下遗憾和疑问,当然花钱肯定要多些,但是我们做考古发掘工作应该宁缺勿滥,少而精或者更好,科学工作需要科学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的工作方法,才能达到科学的目的。上马墓地不是晋国国君的墓地,因为在这个墓地开始使用时国都还在别处(即今天马——曲村遗址一带),这里只是其国都统辖的一个城邑,与上马墓地相对应的城址在哪里现在还没有发现,该墓地墓主的最高级别是五鼎墓,是在晋国比较有地位的卿大夫,要说清是史书所记载的哪位卿大夫,则相当困难,一个原因是史书记载粗疏遗漏而不完整,二是在这些贵族墓葬中没有发现一个墓主名字或与墓主名字有关的旁证材料,所以根据鼎制我们目前只能做一些大致的推测,这些贵族供职晋国“朝廷”,这里是其统辖地或其食邑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其家族或世族共用一个墓地经过西周中晚期到战国初年的多年使用而形成这些墓葬遗存。先秦时期特别是西周春秋时代,鼎制是有比较严格规定的,什么级别的墓主埋葬几鼎几簋是有大致规范的,一般最高者天子为九鼎,以下为七鼎、五鼎、三鼎和一鼎,都是奇数,而与之相配组的簋一般为比鼎少一件的偶数,七鼎一般为诸侯国君埋葬所使用,五鼎为卿,三鼎为大夫,一鼎为士,庶民则无之。过去讲:“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有一定道理和历史根源的。

以上所说的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周礼，周代是宗法封建制社会，宗法等级制是比较严格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到春秋晚期，出现了所谓的“礼崩乐坏”，礼乐制度是贵族宗法制度的一种外在的表现方式，因此我们在考古发掘的墓葬中往往除了发现礼器如鼎、簋、豆、壶、舟、盘、匜之外，还经常可以发现乐器，如石磬、编钟等等，史书中记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所说的礼乐征伐是权力的代名词。征伐指的就是兵器所能，在晋国始祖唐叔虞初封时，周成王分给他“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大路指的是战车，密须之鼓是乐器，阙巩指阙巩国所出铠甲，属兵器，沽洗是一种钟的名字，也属乐器。在考古发掘出土的诸侯墓葬中往往可以发现超越其身份的礼乐兵器，这并不是说文献记错了，而是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文献，礼崩乐坏的意思是说不像以前那样遵守规范了，发生了配置不全或僭越的现象，或者说低等级的贵族有的使用高等级的礼制了，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结果。郭沫若先生曾经说过，周代就是“天子倒楣了，诸侯起来；诸侯倒楣了，卿大夫起来；卿大夫倒楣了，陪臣起来。”历史从所谓的“天下一统”走向四分五裂，西周时期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到了天子或天王所分封的诸侯羽翼丰满的时候，他们就不把天子当一回事了，周天子渐渐成为名义上的首领或诸侯国尊奉的祖位，因为西周分封制是以血缘关系或亲缘关系为纽带来实施的统治方式，同姓诸侯国占绝大多数，异姓诸侯只是很少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代的更替，亲缘关系渐疏远，血缘关系渐淡漠，这种统治方式的根基便开始发生动摇，春秋时代便出现

了多次“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霸权，实际上这时天子就已经是摆设了，春秋时期的多次联盟称霸实际上都没有把天子太当一回事，不过在“尊王攘夷”这个意义上，表面上天子似乎还具有一些号召力，当时华不与夷同，华夏与蛮夷戎狄是对立的，到了春秋早中期时戎狄对周王室和中原诸侯还具有相当大的威胁，周平王东迁洛邑就是被犬戎驱逐的结果。用现在的话来说这就是民族矛盾，实际上古代问题更要复杂一些。在打击戎狄一致对外的问题上华夏诸侯也不得不联合起来，发挥大国强国的作用，也正是这样才产生了春秋五霸，在东周后期，即春秋晚期戎狄或被同化，或被消灭，或被驱逐迁徙，总之对华夏的威胁不是相当严重了，二者之间的矛盾也不是主要矛盾了，而卿大夫们的私家势力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了，羽翼也丰满了，敢于跟国君叫板了，甚至出现了多次诛杀国君的事件，但是大多数国家内部还是在诸侯国君的名义下积累实力，争夺地盘，兼并倾轧，这个问题此时凸现出来。卿大夫们开始兼并土地、奴隶和财产，正是侯马盟书所说的“纳室”，盟书强调“尚敢或纳室者或闻宗人兄弟纳室者而弗执弗献”就要受到神明的惩罚，说明这个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礼崩乐坏正是伴随着社会的这种变化而来，最后卿大夫自立为诸侯，到天子那儿送点贿赂，注个册备个案，也就名正言顺了，将原来的诸侯也作为摆设或迁为庶人，这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和重新洗牌的结果，并由此而进入战国时代。礼乐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等级制度，就像后代的几品官员应该穿什么衣服坐什么轿子一样，是维持统治权力和地位的一种方式、标志。